

胡繩全書

第一卷 (上)

胡繩全書

第一卷（上）

人民出版社

胡繩全書

第一卷（下）

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绳全书 第一卷/胡绳著.

-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98.4

ISBN 7-01-002453-7

I. 胡…

Ⅱ. 胡…

Ⅲ. 胡绳-全集

Ⅳ. C52

胡 绳 全 书

HU SHENG QUAN SHU

第 一 卷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)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33.75

字数:764千 印数:0,001—3,000册

ISBN 7-01-002453-7/Z·81 定价(上下):55.00元

作者小传

胡绳 原姓项，祖籍浙江钱塘。1918年1月11日生于江苏苏州。1934—193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肄业。1935年下半年起在上海一面自学，一面写作，同时参加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文化工作，并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。抗日战争开始后到武汉。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以后几年中，先后在武汉、襄樊、重庆、香港工作，主编和编辑多种报刊，并在这些地方参与党在文化方面的领导机构的工作。1942年又到重庆，在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社工作，直到抗日战争胜利。1946年至1948年，先后在上海、香港工作。1948年10月离开香港，辗转进入河北省平山县解放区，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。1949年参加第一届人民政协，为社会科学界代表团成员之一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在政务院出版总署、中共中央宣传部、中共中央党校、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、红旗杂志社等机构工作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遭受迫害，被撤销一切职务，停止工作。1973年后渐渐恢复工作。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。1985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。他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(1982—1987)，第四、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(1975—1983)，第七、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(1988年起)。

胡绳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哲学、历史、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及写作。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

1780/01

争时期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各时期，除了某些特殊的年份外，在报纸、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其他文章，还发表了一些在哲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著作。他的著述在知识青年中，在学术界、文化界中，在社会上起了很广泛的影响，是文化普及、学术研究和思想教育的宝贵财富。

《胡绳全书》前言

这套书称为《胡绳全书》而不是“全集”。《全集》应该点滴不漏、无所不包地把一个人的全部作品编在里边。坦率地说,出这样的《全集》,作者自认不配。《全书》也不是《选集》,《选集》应该把一个人的著作的精华编在里边。如果是出作者的《选集》,其篇幅不可能像现在的《全书》这样大。

这里所谓《全书》,是界于《全集》和《选集》之间的一种文集,比较完全地反映了作者一生的写作生活的一种集子。

《胡绳全书》包括作者从 1935 年起 60 年间的大部分作品。按照作者的意见,没有收入 1935 年以前发表过的文章,并将现在还能收集到的 1935 年以后的文章淘汰了一部分。

《全书》共分六卷,有几卷有上下册,一共是九册。

第一卷到第三卷是文集,把历年发表在报纸刊物上的文章编辑而成。第一卷分上下册,收的是 1935—1948 年的文章,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时期。第

二卷收的是 1949—1961 年的文章。第三卷分上下册,收的是 1979 年以后,也就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的时期的文章,这一卷到 1996 年。在作者有生之年可能还会加上一些文章,但也不可能很多了。

第四卷到第六卷可以叫作专集,就是把原来出版过单行本的书收集在一起。第四卷中主要包含几种哲学方面的书。第五、第六卷包含了几种历史方面的书。第六卷所收的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》这部著作篇幅较大,所以分为上下两册。这些专著有几种在成书前曾以单篇发表在报刊上,也有几种虽单篇发表过,但在当时没有印成书。由作者主编和参与编写的专著没有收入。

在各卷的卷首都有作者写的引言及序言、前言,对卷中的内容作了作者认为必要的说明。

编辑这部《全书》得到白小麦同志的帮助,没有他的帮助,这部书是出不来的。选编中的缺点则要由作者自己负责。人民出版社乐于出版这部书并为它的出版出了很多力,是值得感谢的。

胡绳重要论著年表

年 份	题 目	见《全书》内
1937 年	新哲学的人生观	第四卷
1937 年	哲学漫谈	第四卷
1937 年	胡适论	第一卷第一辑
1937 年	论近两年来的思想和文化	第一卷第一辑
1938 年	辩证法唯物论入门	第四卷
1940 年	思想方法	第四卷
1940 年	谈思想与思想自由	第一卷第一辑
1940 年	论英雄与英雄主义	第一卷第一辑
1941 年	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	第一卷第一辑
1942 年	评冯友兰著《新世训》	第一卷第一辑
1942 年	论卓别林	第一卷第四辑
1943 年	评冯友兰著《新事论》	第一卷第一辑
1943 年	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 都和我有关”	第一卷第四辑
1943 年	论“诚”	第一卷第一辑
1944 年	评钱穆著《文化与教育》	第一卷第一辑

1944 年	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 关联	第一卷第一辑
1945 年	论所谓“毕其功于一役”	第一卷第一辑
1946 年	二千年间	第五卷
1946 年	中国问题讲话	第四卷
1946 年	论发展生产力	第一卷第一辑
1946 年	一年来人民努力的成就	第一卷第三辑
1946 年	制宪不如散会	第一卷第三辑
1947 年	论自由主义在中国	第一卷第一辑
1947 年	要民主就要“造反”	第一卷第三辑
1948 年	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	第五卷
1948 年	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	第五卷
1948 年	怎样搞通思想方法	第四卷
1948 年	路是怎样铺成的	第一卷第三辑
1948 年	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	第一卷第一辑
1949 年	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	第二卷第一辑
1949 年	太平天国与资本主义外国的 关系	第二卷第一辑
1950 年	“为什么?”	第二卷第一辑
1950 年	立场与方法	第二卷第一辑
1951 年	爱我们的祖国	第二卷第一辑
1951 年	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	第二卷第一辑
1952 年	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性 和革命性	第二卷第一辑

1954 年	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	第二卷第二辑
1954 年	邹韬奋同志一生的工作和斗争	第二卷第二辑
1955 年	论胡适派腐朽的资本阶级人生观	第二卷第二辑
1955 年	中国近代史学习绪论	第二卷第二辑
1955 年	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	第二卷第二辑
1956 年	向列宁学习怎样进行思想斗争	第二卷第二辑
1956 年	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	第二卷第二辑
1957 年	关于哲学史的研究	第二卷第三辑
1958 年	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输入中国的意义	第二卷第三辑
1960 年	中国近代史提纲	第五卷
1961 年	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	第二卷第三辑
1979 年	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和科学	第三卷第二辑
1981 年	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	第六卷
1981 年	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	第三卷第三辑
1981 年	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	第三卷第二辑
1981 年	辛亥革命中的反帝、民主、工	

	业化问题	第三卷第二辑
1983 年	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	第三卷第一辑
1985 年	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	第三卷第五辑
1985 年	在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 讨论会结束时说的话第	第三卷第三辑
1985 年	关于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 问题	第三卷第三辑
1986 年	艾思奇走出的第一步	第三卷第四辑
1986 年	谈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 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	第三卷第三辑
1987 年	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 道路	第三卷第一辑
1987 年	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	第三卷第三辑
1987 年	忆家英同志二三事	第三卷第四辑
1988 年	维护党的团结的楷模周恩来	第三卷第四辑
1988 年	社会科学面临的形势和任务	第三卷第三辑
1988 年	怀念侯外庐同志	第三卷第四辑
1989 年	“五四”和反封建	第三卷第二辑
1989 年	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	第三卷第二辑
1990 年	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	第三卷第二辑
1990 年	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 问题	第三卷第一辑
1991 年	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	第三卷第一辑
1992 年	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	第三卷第一辑

-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1992 年 | 纪念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 | 第三卷第四辑 |
| 1993 年 |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| 第三卷第一辑 |
| | 附：对《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》一文的几点说明 | |
| 1993 年 | 纪念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 | 第三卷第四辑 |
| 1994 年 | 什么是社会主义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？ | 第三卷第一辑 |
| 1994 年 |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| 第三卷第三辑 |
| 1994 年 |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 | 第三卷第一辑 |
| 1996 年 | 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党 | 第三卷第一辑 |
| 1996 年 |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上的作用 | 第三卷第一辑 |

第一卷引言

第一卷包括我在1949年以前的文章。

我曾在1988年编成《胡绳文集(1935—1948)》一书,由重庆出版社在1990年10月出版。本卷以这本文集为基础增补了十几篇短文。1988年我为这本文集写的自序仍保留在卷首。

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1946年,我在上海把抗战期间写的文章编了几个文集,交付出版,那就是《理性与自由》、《在重庆雾中》、《思想方法和读书方法》。这几个集子中的大部分或一部分已收入《全书》的这一卷中。在抗战中期,1940年在重庆,我还编过一本小的文集,叫《夜读散记》,但未能出版,因国民党的出版物审查机构把送审的原稿扣留了。这本原稿在全国解放后一直保留在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内。1994年我参观档案馆,馆中同志把这本原稿提供给我,于是在1996年才在北京印出这本迟出了五十几年的书。这本书中的多数文章也已收入《全书》的这一卷。

在1949年前的十几年中,我还写过一些小书及系列文章,它们现编入《全书》的第四卷和第五卷。编入第四卷的是《新哲学的人生观》、《哲学漫谈》、《辩证法唯物论入门》、《思想方法》、《中国问题讲话》、《怎样搞通思想方法》,编入第五卷的是《二千年间》、《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》、《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》。

1995年11月8日

第一卷引言二

问：胡绳同志，最近我们看到了《胡绳全集（1935—1948）》。这本书收有170篇文章，70多万字。根据时间推算，这些文章是您在18岁到30岁时写的。您能不能谈一谈，为什么您能在这样年轻时就写出这么多文章？

答：我在30岁以前写的文章，实际上还不止这些。我在编辑这本文集的时候，把收集到的文间选择出大约一半，编在这个集子里面。其他还有些文章已经收集不到，而且大多我也不想收集了。在那些年代里，我还写过、出版过六七本专题的书。在那时期，我写的东西可以说是相当多的。

为什么要写这么多？主要由于客观的需要。那时是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，客观上确有许多问题、许多现象使人心神不安，使人苦恼，使人激奋，需要思考，需要评论。而且也有些报纸、杂志要我写文章。我当时虽然有些别的工作，但主要工作就是为报纸、杂志写文章。

问：那么胡老，请问您是怎样开始写作的？

答：要说开始写作，那么我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，最初的写作就是在小学、中学的作文课上。但我在学生时已经开始写作文课以外的文章。记得在初中时候曾和两个同学一起，把个人写的文章誊写出来，订在一起传阅。到了高中，我还和一些同学办壁报。那一

年是1933年,正是马克思逝世50周年,我们为纪念马克思出了一期壁报。至于说把文章用铅字排印出来,除了给学校的校刊和作为中不投寄到沉重杂志上的文章以外,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在1934年。那时我搞稿给《中华日报》的一个叫“动向”的副刊。这个副刊是左翼作家聂绀弩编辑的。当时我并不认识聂绀弩,他发表了我这个高中学生投寄去的一些小文章。这些文章现在我都没有再去找寻了。在鲁迅先生的《花边文学》中有一篇《汉字和拉丁化》的文章里面提到胡绳,他指出我在《走上实践的路去》一文中的说法是不恰当的。那时鲁迅先生在“动向”上发表了不少文章,不过用的是笔名,我并不知道这是鲁迅先生的文章。虽然我开始写文章在报刊发表是在1934年,但是收在这个文床里的最早一篇文章却是在1935年写的。

问:你在集子里收的最早一篇文章是哪一篇呢?

答:我这个文集里按文章性质分了四个部分,也就是四辑。每一辑里的文章,按照时间顺序排列。最早的一篇文章是第四辑“杂文”中的第一篇。这篇文章题目叫《报复》,那是1935年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写的(我只在大学读了一年)。文章的末尾还记明是“3月16日晚在北平图书馆”,那就是在北海旁的图书馆。对这篇文章也可以简单说几句话。我本来已经忘记了这篇文章。但是有一次偶然看到1927年到1936年的《新文学大系》(杂文卷)中收入了《报复》这篇文章。这篇文章当时是投寄给上海由曹聚仁主编的《芒种》杂志的。我很佩服杂文卷的编者丁景唐同志,他竟然这样勤于爬罗剔抉,注意到了这篇短文。因为《新文学大系》选登了这一篇文章,就使我有勇气把我在20岁以前写的这篇文章收入这本文集里。

问:那么,您在20岁以前写的文章,在文集里还收了多少篇呢?

答：我在1938年1月满20岁。所以1936、1937年写的文章都是20岁以前写的。在这个集子中大概有十四五篇，当然只占极小部分。这十几篇里多数是收在“思想文化评论”这一辑里的。对这些文章我想就其中的两篇说一说。一篇是《胡适论》。那时我参与办一个名叫《新学识》的杂志。这个杂志起先叫《生活知识》，被国民党当局查禁了。改名《新知识》，又被禁，然后才改成《新学识》。参加办杂志的有一位搞戏剧的张庚同志他和我商量，想在这个刊物上搞点新的栏目，于是我们就设立了一个人物专栏。张庚写了一篇《梅兰芳论》，我写了一篇《胡适论》。这篇《胡适论》写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前。后来在50年代开展批判胡适运动时，有人找出了这篇文章。有的同志觉得这篇对胡适的评论还是比较公允的。附带说一下，在我的这个文集里面涉及胡适的文章有好多篇。在1946年7月胡适从国外回来，准备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，我还写了一篇对他表示欢迎的文章（即《新文化运动的根、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》）。胡适在回国后，参加了国民党一党包办的“国民大会”，而且从蒋介石手里接受什么宪法草案。我于是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批评文章，这就是“时事政治评论”中《制宪不如散会》这一篇。后来胡适又向学生说什么“理未易明，善未易察”，我忍不住又写了篇短文加以驳斥，即“杂文”辑中的《理未易明么？》。

现在回过头来说1937年我写的另一篇文章《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》。这篇的题目不大引人注意。当时，在《新学识》杂志上，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，认为既然要抗战，各方面都有抗日的共同要求，那么就不必再有什么各派、各种思想的区别。他的说法是要大家都“把各种主义中的高远理想暂时搁起，而共趋于民族解放之途”，因此他主张“思想的统一”，而且要由政府来统一思想，“消除人民思想的纷争”。我看了这篇文章，认为这个意见